

Intellectual Inquiry

在历史的缠绕中解读知识与思想(下)

人文译丛

人文译丛
卷二
知识、思想与历史
在历史的缠绕中解读知识与思想(下)

中国思想史

第二卷

在历史的流变中解读制度与思想

《中国思想史》第二卷，是《中国思想史》系列丛书的第二本。

《中国思想史》系列丛书，是《中国思想史》系列丛书的第二本。

《中国思想史》系列丛书，是《中国思想史》系列丛书的第二本。

《中国思想史》系列丛书，是《中国思想史》系列丛书的第二本。

《中国思想史》系列丛书，是《中国思想史》系列丛书的第二本。

《中国思想史》系列丛书，是《中国思想史》系列丛书的第二本。

《中国思想史》系列丛书，是《中国思想史》系列丛书的第二本。

《中国思想史》系列丛书，是《中国思想史》系列丛书的第二本。

《中国思想史》系列丛书，是《中国思想史》系列丛书的第二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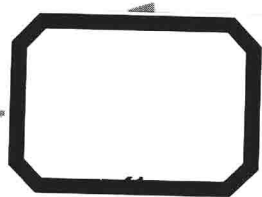
《中国思想史》系列丛书，是《中国思想史》系列丛书的第二本。

《中国思想史》系列丛书，是《中国思想史》系列丛书的第二本。



人文译丛 总主编◆何怀宏

Intellectual Inquiry



在历史的缠绕中解读 知识与思想(下)

贺照田 ◆ 主编

吉林人民出版社

JILIN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振大汉之天声

——民族英雄系谱与晚清的国族想象

沈松桥

一、前言

近年来西方学界对国族 (nation)^① 与国族主义 (nationalism) 的大量研究，大抵都扬弃了纯粹“根基论” (primordialism) 的立场，改而采取偏向“建构论” (constructionism) 或“工具论” (instrumentalism) 的观点。在这样的学术认知中，“国族”，一般而言，不再被视作由血统、语言、文化等根基性纽带 (primordial ties) 自然衍生的“既定资赋” (given)；反之，“国族”乃是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被“发明”、被“建构”出来的“想象的社群” (imagined community)。^② Liah Greenfeld 便指出：世上并无“蛰伏不觉” (dormant) 的国族等着我们找出其先天与俱的客观“国族特性” (nationality)，以便将其自酣睡中唤醒：反之，人们乃是先被灌输一套虚构的国族认同，才会相信他们自己是一个统一的“国族”群体。^③ 换句话说，是国族主义意识形态催生了国族，而不是国族激发了国族主义的情怀。^④

不过，犹如 Renato Rosaldo 对建构论者的族群理论所作的批评，^⑤ 把“国族”当做是“想象”的产物，并不是问题的结束，反而是更多问题的开端。如果“国族”确实是一个“想象的社群”，我们不免要追问：是谁在想象？是通过怎样的文化、符号过程来进行想象？这样的想象又造成怎样的结果与影响？^⑥

这些复杂的问题，头绪纷繁，牵涉多端，迥非本文所能解决。虽然，

我们或许还是可以从一座人物塑像寻得一些思考的线索。

这座落成于 1902 年的雕像，矗立在匈牙利首都布达佩斯的市立公园。雕像本身朴实无华，不足称道，却是像主的身份发人深思。这座雕像纪念的，既非位高权重的王公巨卿，也不是声名显赫的文臣武将，而是一位平凡卑微、名姓无传的书记。约当 13 世纪左右，这位书记撰写了举世第一部“匈牙利”历史——*Gesta Hungrorum*，将当时匈牙利地区人群发展的轨迹，追溯到西元 5 世纪匈奴英雄阿提拉（Attila，406—453）的军事征服，从而为 19 世纪的匈牙利国族主义运动提供了广阔的想象空间与坚固的认同基础。^⑦

从这段轶事，我们可以窥见国族建构过程的一个特殊面相——一个文化“表达”（representation）的层面。这座书记雕像隐约指出：匈牙利这个“国族”所以存立的关键，与其说是“上帝之鞭”的征服行动，毋宁更是对此一历史事件的“叙事”（narration）与表述。就此而论，“国族”，乃是通过历史叙事的召唤，才可能被想象出来。Geoffrey Bennington 便说，“在国族的核心处，我们无疑可以找到一堆叙事；这些叙事包括国族起源的故事、建国先祖的神话，以及（国族）英雄的系谱。”^⑧

对于历史叙事与国族的密切关系，研究国族及国族主义的学者早有所见。1882 年，Ernest Renan 在他那篇著名的演说〈何谓国族？〉中，便已明白指陈：“辉煌的历史、伟人、荣耀等等，乃是国族形成的社会资本。”^⑨ Anthony Smith 也指出：“为了创造一套足以令人信服的‘国族’表述，必定先要重新发现并夺占（appropriate）一个光荣而独特的‘过去’。”^⑩ 社会学者 David McCrone 甚至强调：“任何‘国族’都必须有历史，否则便无法成为‘想象的社群’。”他还引述了 Ernest Gellner 的警句：“没有历史的国族，乃是没有肚脐的国族。”^⑪

这些学者的论点也可以在世界各地实际发生的国族主义运动中，得到印证。19 世纪下半叶，领导“少年拉脱维亚”（Young Latavia）从事民族独立运动的 Atis Kronvalds 便主张，为了促进爱国热情，“国族历史”乃是最足珍惜的知识形式。^⑫ 独立后的非洲国家纳米比亚（Namibia）为了凝聚

国族意识，更透过各种策略，极力动员“历史叙事”与“历史表述”，将既有的族群过去重新界定为“国族的历史”，将部落的传统英雄改扮成国族的“解放斗士”。^⑬至于19世纪德国知识分子如赫德（Johann G. Herder, 1744—1803）、费希特（Johann G. Fichte, 1762—1814）等人之汲引历史书写以为推展国族统一运动之手段，尤为众所周知的具体史例。无怪乎 Anthony Smith 要将历史学者与语言学者并列为国族与国族主义的立法者与创造者；此亦所以 Eric Hobsbawm 要把历史家与国族主义者的关系比喻作巴基斯坦罂粟种植者与海洛因吸食者之间的关系。^⑭由是以观，20世纪初年，当晚清知识分子群起致力于近代中国国族建构时，竟亦同时展开一场声势浩大的“史界革命”，为中国现代史学的发展奠定初步的基石，当然也不是无因而至的了。

然而，伴随国族与国族主义，俱生共荣的“历史”，绝非专业学院史家所应提供的“历史”。^⑮Renan 固然高度强调国族建构过程中历史的重要性，却也敏锐地观察到：遗忘历史，乃至扭曲历史，才是国族创立的枢纽；历史研究的学术进步往往只会对国族意识造成严重的威胁。^⑯

所以如此，盖与国族建构的内在逻辑密切相关。众所周知，任何集体认同都是在社会过程中建构而成；然而，吊诡的是，集体认同最重要的任务之一，却是竭力掩盖自身的建构本质。惟有在人为斧凿的痕迹消弭尽净之后，被建构而成的群体，才可能以“自然”的姿态展现，从而要求其成员不容置疑、无私无我的牺牲奉献。^⑰“国族”所以深撼人心，致令千万生灵全心相许、生死以之的魔力根源，也正在其透过一套特殊的历史叙事，完成了“自然化”的过程。用 Benedict Anderson 的话来说，“历史”为“国族”填补了过去与现在之间的鸿沟；借由一套经过独特安排的“历史”，国族才能将其自身投射于“渺远的过去”，并引向“无边无际的未来”，进而发挥俗世化的宗教性功能，把个人与群体生命中的“偶然”转化成为既定的宿命；也正因如此，国族才能激发国族成员最为深沉壮阔的热情。^⑱这样的“历史”，自然只能是一种“神话历史”（myth-history）^⑲或 Paul Ricoeur 所谓的“历史意识形态”（ideologies of history）^⑳。然而，这套

“神话历史”或“历史意识形态”，却对国族的符号性建构与群体凝聚力的创造，发挥了无与伦比的决定性作用。^②如果我们借用 Walter Benjamin 睿智的寓言，把“国族”比喻作在棋赛中攻无不胜、战无不克的机器人，那么，“历史意识形态”便是那个躲在棋盘桌下的驼背侏儒。^③

在近代中国国族建构的过程中，我们可以从晚清最后十年间大量涌现的“民族英雄”历史书写，明白窥见这种“神话历史”或“历史意识形态”的运作。

如上文所引 Geoffrey Bennington 那段话所示，在国族想象的伟大工程中，“民族英雄”无疑扮演了极为重要的角色。黑格尔（Friedrich Hegel，1770—1831）把国族界定为由习俗、历史记忆与共同命运所构成的社群；国族历史中的英雄，便和该群体历代相传的神祇、天使、魔鬼与圣人等等，同样铭刻于国族成员的心灵深处；国族的公共庆典、运动竞技、宗教庙堂，乃至国族国家的内政机构与外交事务，几乎无处不见对这些人物英勇事迹的缅怀与颂赞。^④Anthony Smith 也指出：在族群团体迈向国族建构的蜕变过程中，为了强化群体的凝聚力量，一方面要提供群体成员自我认知的“地图”，另一方面更要从族群的历史记忆中发掘过往的英雄人物与光荣事迹，作为国族成员仿效师法的道德典范。这些“民族英雄”是否真有其人，其事迹是否确切可考，概与宏旨无涉，重要的是：他们必须被表述成国族精神的具体表征，必须化身为忠诚、高贵与自我牺牲的伟大楷模，以便激发后世子孙仰慕追法、为国族整体奋斗奉献的信念与决心。^⑤亚瑟王（King Arthur）之于英国、齐格菲（Siegfried）之于德国、威廉泰尔（William Tell）之于瑞士、阿格曼依（Agamenon）之于现代希腊，便都是在国族主义文化逻辑的推动下，从湮没颓圯的坟冢堆中，被召唤出来，披上“民族英雄”的冠冕，成为各该国族认同膜拜的文化符号——即使他们自己未必了解“英国”、“德国”、“瑞士”与“希腊”究竟是什么意思。^⑥

晚清知识分子同样也是在国族主义的风潮鼓荡下，着手编造中国“民族英雄”的光荣系谱。为了“唤起国魂”、“振兴民族”，他们透过一套由特定的“框架、声音与叙事结构”所构成的论述策略，^⑦将上起秦汉、下迄



明清，前后二千年间的历史人物，扯出其原有的历史脉络，重加评鹭，编次甲乙，终至为近代中国的国族认同修建了一座华丽璀璨的殿堂——民族英雄的万神庙。

由是以观，以晚清为滥觞，而由后世踵事增华所成立的中国“民族英雄”系谱，或许和彼时另外一个备受关注的神话人物——黄帝一样，可以被当做是凝聚近代中国国族认同的重要象征资本（symbolic capital）^②；中国国族，当然也可说是由对这些“民族英雄”的历史叙事与表述，所编造出来的一个“想象的社群”。

虽然，犹如黄帝符号曾在当时引发激烈的论争与辩驳，透过特定编码（encoding）方式，由“民族英雄”叙事所建构出来的中国“国族”，^③无论就其边界抑或本质而言，都不是一个固定而同质的整体。反之，在“历史意识形态”支配下的“民族英雄”叙事，其所能促生的国族想象，无可避免地将是一个不断漂移、流动的无定之物，也将是一个充满质疑、抗争与妥协的权力场域。如 Anthony Cohen 所言，“历史”具有高度的可塑性，它的具体形貌永远取决于不断的诠释与重构。^④任何基于特定视野与现实利益编造而成的历史表述与叙事，固然可以借由其所运用的诠释架构与论述策略，制造“真理效应”（effect of truth），^⑤乃至垄断“象征权力”（symbolic power），却仍将不断面临不同表述及叙事的挑战与抗争。晚清的“民族英雄系谱”，便是这样一个“历史政治”（politics of history）^⑥展演的舞台。在当时政治取向泾渭有别的知识分子群体间，我们可以找到不同的“民族英雄系谱”；从这些不同的“民族英雄系谱”，我们更可以找到争持对立、抗辩不休的不同的中国“国族想象”。

二、“史界革命”与“民族英雄”的诞生

自 1887 年曾纪泽发表《中国先睡后醒论》一文以降，^⑦“睡狮”一语旋即不胫而走，喧腾众口，蔚为近代中国知识分子最常用以况喻国家处境的意象。^⑧所以如此，不难索解。盖若中国不过暂时酣睡，本质上固仍不失

其英雄壮武，则寄望于中国未来之辉煌荣景，当然也就不是痴人说梦、河清难俟的了。

不过，“睡狮”之喻纵可有效纾解中国知识分子的心理焦虑，却也不免引发一个更为棘手、更为迫切的难题：究竟是什么因素使得这头兽中王者萎然长卧、衰靡不振，坐令封豕长蛇，纵横禹域，欧风美雨，沛然莫御？要透过怎样的努力，才能解除魔咒，使中国自漫漫长夜中瞿然警醒？

对于这些问题，梁启超率先提出一项具有典范意义的答案：民族主义。20 世纪的最初数年间，任公先后草成〈国家思想变迁同异论〉与《新民说》等文，从“社会达尔文主义”（social Darwinism）的观点，盱衡世局，慨然指出：自 16 世纪以来，欧洲各国拜民族主义之赐，日益发达，驯至 19 世纪末期，更扩张而为民族帝国主义，遂挟全民族全体之能力，向外侵略，以与中国相竞争；乃中国“于所谓民族主义者犹未胚胎焉”，以此而欲与“世界所以进步”之“公理”相抗衡，固若以卵击石，绝无幸理。因此，中国苟欲抵御列强侵袭，“以挽浩劫而拯生灵”，其唯从速养成“我所固有之民族主义”一途可循。^④

然则，吾人又当循何途径，以养成“我所固有之民族主义”？梁启超开出的药方之一，便是：历史。^⑤1902 年，任公在〈新史学〉一文中，开宗明义，便极力强调，欧洲民族主义所以发达，文明所以日益进步，泰半为历史之功；以故，中国如欲于世界竞争之大潮中屹立不摇，自不能不追法欧西，讲求历史之学：

今日欲提倡民族主义，使我四万万同胞强立于此优胜劣败之世界乎？则本国史学一科，实为无老无幼、无男无女、无智无愚、无贤无不肖所皆当从事，视之如渴饮饥食，一刻不容缓者也。^⑥

梁启超之外，抱持类似观点者，亦正不乏人。1903 年，《浙江潮》的编者为文评介曾鲲化所著《中国历史上卷》，便说：“历史为国魂之聚心点，国



民爱国心之泉源。”^{③7}《江苏》杂志上一位不知名的作者在阐释中国民族精神时，也指出：一国之民族精神以历史与土地为根源，而历史之关系尤为紧要，“故言民族之精神，则以知民族之历史与其土地之关系为第一义，而后可以进而言生存竞争之理。”^{③8}

但是，任公与同时期的知识分子虽对历史怀着如此热烈的期许，他们从传统历史叙事与文本所找到的中国的过去，却是一幅集黑暗、腐败与堕落之大成的黯淡景象。梁启超在《新民说》中痛陈中国数千年之历史“脓血充塞”，致使国民人格日趋卑下。^{③9}1903年，《国民日报》发表“箴奴隶”一文，更直指中国民族乃“生而为奴隶者也”，所以如此，盖肇因于中国三千年之历史不过“独夫民贼普渡世人，超入奴隶之宝筏”耳。^{④0}

既然中国的实际历史只是一部不断退化、充满耻辱的不光荣的纪录，那么，正如曾鲲化的感慨之语：“其尚得曰中国有历史乎？何配谈中国历史乎？”^{④1}从黑格尔的历史定义而言，中国显然还不是一个“独立自觉”的“历史的民族”。这样一个“非历史的民族”，又如何可能养成“我所固有之民族主义”？

在这里，梁启超等人显然陷入了近代亚非后进国家国族主义运动中屡见不鲜的一项困境。研究印度殖民地国族主义运动的 Partha Chatterjee 曾指出：西方近代国族主义是一套标榜普遍性意义的知识架构，并以超越各文化的畛域相号召。后进国家的国族主义者在接受这套知识架构时，同时也默认了伴之以俱至的西方“现代性”诸价值的普遍适用性；但是，国族主义的核心信念却又强调每一个“民族”历史文化的自我认同与独特性。因而，这些国族主义知识分子不能不既接受又反对这套来自异文化的知识与道德上的宰制，长期摆荡于“现代”与“本土传统”之间，徘徊踌躇，莫之能决。^{④2}梁启超等人为了应付“生存竞争”的挑战，不能不接受国族主义及其所夹带的“现代性”价值，并据此否定中国的“过去”；但是，作为一个“国族主义者”，他们又不能不肯定中国历史传统自有其赖以存立的独特意义，不能须臾背离。^{④3}

为了消弭这项紧张，第三世界知识分子最常采取的策略，要不外乎致



力于自身历史文化的“再诠释”，借以重行“发现”或“振兴”足以契合“国族主义”之现代性价值，却又能够彰显国族独特性的“真正”传统。^④晚清知识分子也不例外，他们正是从“历史真实”与“历史表述”之间的落差，寻得了上述问题的解决方案。换言之，在他们看来，中国历史所以积弊深重，并不是“历史”本身的错误，而是传统史家未能恪尽职守，有以致之。曾鲲化便曾回应上文所述的“睡狮”问题，大力抨击二千年来“独夫民贼、巨奸大盗”混浊国民脑筋、束缚国民手足，致使国人原有之蓬勃生机为之摧折；而“犯万世之不韪，为国民之公敌，袒毒民贼民者之门阀，而抹煞人间社会一切活泼文化之现状者，则历代史家实尸其咎。”^⑤《觉民》杂志作者重光也明白指斥传统史家所为历史书写如《二十二史》、《通鉴》等，不过“余一人之家谱”，于中国民族之性质，“阙焉无闻”；积习熏染，“国民之人格亡、爱情塞、道德堕落，而为优等人所压服”；追原祸始，“始作俑者，其罪真上通于天矣”。他甚至主张，为振救斯弊，“必取数千年蠹虫之历史彻底而燃烧之”。^⑥这些对传统历史书写的责难，用邓实的话来概括，便是：“中国无史矣！非无史，无史家也；非无史家，无史识也。”^⑦

正由于传统史家缺乏“史识”，他们对中国“过去”所作的叙事与表述，自是流弊丛滋，贻祸无穷。梁启超便认为二千年来传统史学卷帙虽繁，要皆不脱“四蔽二病”，陈陈相因，一丘之貉，“曾无有足以激励其爱国之心、团结其合群之力，以应今日之时势而立于万国者”。^⑧而在这无数弊病之中，其影响最巨、罪愆尤重者，殆莫过于“历史主体”的隐晦沦胥：

法国名士波留氏尝著《俄国通志》。其言曰：俄罗斯无历史。非无历史也，盖其历史非国民自作之历史，乃受之自他者也；非自动者，而他动者也。其主动力所发，或发自外，或发自上，或自异国，或自本国；要之，皆由外部之支配，而非由内部之滋生，宛如镜光云影，空过于人民之头上……云云。今吾中国之前



史，正坐此患；吾当讲此史时，不胜愤愤者在于是；吾尝著此史时，无限困难者在于是。^{④9}

传统史家既未能正确掌握历史的“主体”，则其所为之历史表述与叙事，断非中国“过去”原有之真貌，而只能是历代统治者一家一姓的偏私纪录。1897年，梁启超首发其绪，即已指斥中国二千年来的历史文本，如正史、编年、载记、纪事本末诸流亚，“强半皆君史也”，“不过为一代之主作谱牒”。^{⑤0}逮及20世纪初年，“君史”叙事传统更蔚为万矢齐注的抨击对象。1901年，梁启超在“中国史叙论”一文中申引前义，再度指出：前代史家，“只见有君主，不见有国民”，致其所为史传，“不过记述人间一二有权力者兴亡隆替之事；虽名为史，实不过一人一家之谱牒。”^{⑤1}他甚至抨击所谓《二十四史》者，不过“地球上空前绝后之一大相斫书”耳；流毒所及，“吾中国国家思想，至今不能兴起”，是“数千年之史家，岂能辞其咎耶？”^{⑤2}

任公而外，晚清醉心改革的激进知识分子对中国史学传统提出类似批判者，比比皆是。1902年，马叙伦撰“史学总论”，强调史学著述当以“保国伸民”为宗旨，乃中国自秦汉以降，“史非民有，暴君酷吏，接迹后世，而史氏之称颂，洋溢行间，不问其贤与否也。史无公心，此污秽灭亡之史，不足观也。”^{⑤3}邓实则在《史学通论》一文中，慨然喟叹中国三千年来竟无一卷契合历史真精神之史著，“其所有则朝史耳，而非国史；君史耳，而非民史；贵族史耳，而非社会史。统而言之，则一历朝之专制政治史耳”。以是，中国旧史殆仅可谓为帝王之历史，“舍帝王以外，无日月；舍帝王以外，无风云。其所传威名彪炳之将帅，则攀附帝王者也；其所纪功烈懿铄之元勋，则奔走帝王者也；其所谓循吏传、儒林传、文苑传，则帝王下走之舆台也、帝王弭笔之文士也。”龙猪莫辨、棼如乱丝，而中国遂无史焉。^{⑤4}1903年，曾鲲化于其所著《中国历史》的序言中，更认为历代史家徒知“效死力于专制君主，以尽奴颜婢膝之本领”，“崇拜千百奇妖魔鬼，以奴隶神明贵胄之无量数美男儿；汇积累累串珠之墓志铭，而垄断



国民活动荣耀的大历史”；浸假而“余一人朕天子之世系谱车载斗量，而中国历代社会文明史归无何有之乡；飞将军大元帅之相斫书汗牛充栋，而中国历代国民进步史在乌有子之数”，“奇耻巨憾，畴甚于斯？”^⑤

苟如上引诸人所言，传统以“君史”为核心的史学论述，为害乃深重若此，甚至蔚为“现今灭亡风潮之殆宥、之翻飞之总原因”^⑥，则在民族主义的要求下，对中国“过去”的历史表述，焉有不根本廓清、彻底改造之理？于是，晚清知识界遂有“史界革命”之倡议。1902年，梁启超首揭义帜，高标此旨：

呜呼！史界革命不起，则吾国遂不可救。悠悠万事，惟此为大。^⑦

呼声既出，山鸣谷应，一时之间，前吁后喁、竞为桴鼓者，所在多有。邓实便在同一年间挺身回应任公的呼吁：

悲夫！中国史界革命之风潮不起，则中国永无史矣。无史，则无国矣。……新史氏乎！其扬树旗帜，放一大光明于二十世纪中国史学界上，以照耀东洋大陆乎！鸡既鸣而天将曙乎！吾民幸福，其将来乎！可以兴乎！^⑧

次年，曾鲲化也在所著《中国历史》首编〈总叙〉一章中明白宣称：“今欲振发国民精神，则必先破坏有史以来之万种腐败范围，别树光华雄美之新历史旗帜，以为我国民族主义之先锋。”^⑨

就在这一连串“史界革命”、“史学革新”的呐喊声中，近代意义的中国史学于兹创生。^⑩

可想而知，这一套崭新的史学论述，既然发端于对传统“君史”叙事结构的批判与否定，则其戮力以赴，所拟确立的历史主体，自非专制君主的对立面——“国民”莫属。梁启超于1897年首开“君史”批判之滥觞，



同时也揭出“民史”的名目。^⑤其后，他更进一步将本无特定内涵的“民”转化为现代意义的“国民”，并结合社会达尔文主义的进化原则，树立了以“国民主体”与“进步”概念为支柱的近代中国国族主义“新史学”的理论矩矱。^⑥1901年，任公在《中国史叙论》中指出：“近世史家，必探察人间全体之运动，即国民全部之经历，及其相互之关系。”^⑦次年，他又在《新史学》一文中反复致意、阐发斯旨：

夫所贵乎史者，贵其能叙一群人相交涉、相竞争、相团结之道，能述一群人所以休养生息、同体进化之状，使后之读者爱其群、善其群之心，油然而生焉。^⑧

因此，任公号召中国史家效法“泰西之良史”，为国民而作史，“以叙述一国国民系统之所由来，及其发达进步、兴盛衰亡之原因结果为主”。^⑨同年，邓实也援引日人加藤弘之的说法，诠释“民史”的定义与功能。他认为，所谓“民史”者，当以“一群之进退、一国之文野、一种之存灭、一社会之沿革、一世界之变迁”为范围；而“民史”之所以可贵，“贵其能叙述一群人所以相触接、相交通、相竞争、相团结之道，一面以发明既往社会政治进化之原理，一面以启导未来人类光华美满之文明”。^⑩刘成禺则从“种族”的角度，宣扬历史与民族的联系：

夫所重乎历史者，重其能述一种民族中一团体一分子之原理、其苗裔繁衍之情况，描写祖国惠彼后人，使生爱种之遐心也；逆叙一种民族中已去事实、将来影响，足以扩充吾种之条例、代画保种之良策也。^⑪

曾鲲化更以激昂高亢的笔调，把历史与“国民”的关系，发挥得淋漓尽致：

不佞为四万万同胞国民之一分子，愿尽四万万之一之义务，



为我国民打破数千年腐败混杂之历史范围、掀拔数千年根深柢固之奴隶劣性。特译述中国历代同体休养生息、活动进化之历史；以国民精神为经、以社会状态为纬，以关系最紧切之事实为系统，排繁冗而摘要言、革旧贯而造新体，寻生存竞争、优胜劣败之妙理，冤枉尺直寻、小退大进之真相，……以为我国自古以来血脉一统之庞壮国民，显独立不羁、活泼自由之真面目。^⑧

综括以上各家论述，灼然可见，晚清“新史学”所关怀的焦点之一，或许可以用《游学译编》所刊广告中的寥寥数语做一粗略的概括，语曰：“考求民族进化之原则”^⑨。

就是在新史学以“民族进化”为标榜的呐喊声中，中国国族，透过一套由新的语汇与叙事结构所构成的论述策略，被建构为一种根基性、本质性、统一而连续的集体偶像，并进而取得中国历史主体的特权（privileged）地位。相应于此，中国的“过去”又反过来在这套“国族叙事”的霸权支配下，被转化成国族起源、发展的历程。用 Elie Kedourie 的话来说：在国族主义意识形态笼罩下，“过去”永远是国族的过去，一切既有的成就都是国族的成就，都被当做“国族精神”的具体表现来保存、纪念与承受。^⑩梁启超在《中国史叙论》中讨论历史分期问题，主张以民族的兴衰隆替，取代王朝的更迭，作为中国历史断代的标准，便充分显出国族主义历史意识形态运作的痕迹。^⑪从他所撰的《爱国歌》，更可以看出在炽热的国族感情激励下，中国的“过去”如何被表述成国族连续而悠久的历史“历史”：

彬彬哉！我文明。五千余岁历史古，光焰相续何绳绳，圣作贤述代继起，浸濯沉黑扬光晶。……结我团体、振我精神，二十世纪新世界，雄飞宇内畴与伦？可爱哉！我国民。可爱哉！我国民。^⑫



另一方面，从上述引文中，任公对中国在 20 世纪“雄飞宇内”的殷切期望，我们还可以看出近代中国“国族”建构的另一个侧面。如前所论，中国国族，自其诞生伊始，便与充满现代性色彩的“进步”观念密切结合，不可分割。而在“进步”观念的预设中，国族不但有着一个“过去”，也应该有一个“未来”；不但是一套“历史”，同时也是一套“计划”（project）。^⑦在这样的国族主义历史论述下，中国国族乃是一个集体性的历史主体，注定要在现代性的未来中，实现它的宿命（destiny）。^⑧

然而，吊诡的是，这个国族的“宿命”，既是“过去”的延续，同时也是对“过去”的否定。在这层意义下，中国国族的“历史”，毋宁乃是一种费希特式的历史。

1806 年，普鲁士大军于耶拿（Jena）一役惨遭败衄，国势陵夷、人心危疑，费希特乃于斯时奋袂兴起，发表著名的《告日耳曼国民书》，借以激发德人“灵魂的力量”，进而塑造一个个人自由与群体命运休戚相关的国族组织。^⑨在前后十四场的公开演讲中，费希特大声疾呼，勸勉他的日耳曼同胞承袭往昔先祖崇高伟大的荣誉，发扬“民族精神”，为后世子孙树立足资缅怀追法的道德楷模。^⑩然而，费希特所谓的“民族精神”，并不是在长期历史过程中积累渐铄而成的文化与行为特质，而是植基于若干根基性因素，并超越历史实际经验的形上本质。因而，他所鼓吹的“新历史”，便是以弃绝背离此一根本精神的“过去”，直探国族本然、实现国族先天宿命为号召。^⑪

晚清国族主义知识分子所揭橥的“新史学”，其所薪向的真正标的，同样并不是历史事实的考订厘梳，而是要“浸濯沉黑”、以扬光晶，扫除长远“过去”所遗留的积垢迷障，将国族本质自重重樊篱中解放出来、将中国“国魂”从黑甜梦乡里唤醒起来。^⑫1903 年，《国民日报》的一位作者，便对所谓“国魂”作过这样的界定：

夫国魂云者，乃国民一种固结不解之特性，……自有人以迄今后之无量劫，其全数国民皆为此一特性所陶铸，薰染遗传，日





益进化。一国民必有一国民特有之魂，或明显或隐伏，皆可元始要终，征之于历史。^⑦

虽然，这种可“征之于历史”的中国“国魂”，却往往在历史的时间进程内消磨融蚀、隐晦难明。同年《浙江潮》所刊〈国魂篇〉的作者便指斥国人长期养就的诸般恶习，乃是“国魂”沉沦、民族危亡的祸源厉阶；“习惯不去，国魂不来”，因此，苟欲振拔中国民族之精魂，必也出之“一二雷霆之举”，以“震撼摧磨扫荡群习”，而“复古人创业之精神”。^⑧其唯如此，中国前途，庶乎有彀。

在这种“振兴国魂”的号召下，“历史”的首要职责，当然不外乎如何动员“过去”的光荣记忆，以阐扬国族特质，砥砺国族感情，进而实现国族命定的“未来”。然而，如此一来，原本是“国族”创生者的“历史”，却在国族主义论述策略的不断位移与转换之间，变成了捍卫“国族”、为“国族”效命的忠心奴仆。1902年，梁启超在评介日人市村瓚太郎与泷川龟太郎合撰之《支那史》一书时，便说：“本国人于本国历史，则所以养国民精神、发扬其爱国心者，皆于是乎在。”^⑨1903年，曾鲲化于所撰《中国历史》的“内容要点”中，也坦承其编纂该书的动机，是要“调查历代国民全部运动进化之大势，最录其原因结果之密切关系，以实国民发达史之价值，而激发现在社会之国魂。”^⑩由此可见，晚清知识分子的史学论述，并不只是指向一个“渺远的过去”，更要透过“振兴国魂”、“发扬民族精神”等手段，展望“无边无际的未来”。1906年，上海文明书局编辑出版的《国民新读本》有曰：“历史者，非徒为古人作纪念之碑，将为今人发爱群之想”^⑪，便简要地勾勒出这一套“历史意识形态”的动力根源。

然则，在汗牛充栋、漫无涯涘的历史文本堆里，究竟哪一种历史文类最能契合激扬种性、振兴国魂的要求？晚清知识分子提出的答案是：“民族英雄”^⑫的历史叙事。在前引〈国魂篇〉一文中，作者于申明“国魂”之义后，接着便说：

